

政治风险与中国企业对非洲直接投资

陈 思 马野青

内容提要 基于2006—2012年中国企业对非洲20个国家OFDI的面板数据,本文检验了非洲各国政治风险和中国企业对非洲OFDI的投资流量、投资个案数、投资行业结构数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政治风险指数变量对我国企业OFDI流量、商贸服务和生产销售类行业个案数不具有显著影响,对投资个案数、技术研发和能源资源类行业个案数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从投资动机来看,对于投资个案数和投资行业构成个案数,中国企业表现出明显的资源寻求和效率寻求动机,但市场寻求动机只对投资流量具有显著影响。

关键词 对外直接投资 政治风险 行业构成

陈 思,南京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世界经济博士研究生 210093

马野青,南京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教授 210093

一、引 言

中国企业作为非洲大陆的后来者,利用高风险国家拥有的优势机遇、潜在的经济利益吸引了大量中国企业前往。一方面,获取非洲丰富的矿产和石油等自然资源是对非投资的主要动机;另一方面,中国和非洲双方在商品结构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中国将国内过剩劳动力和资本转移到自然资源丰富地区,实现国家与部门之间的要素转移;再者,随着非洲经济增长,非洲显现出较大的市场潜力,中国企业将非洲当做销售产品市场。然而,由于非洲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因素,中国企业对非洲投资面临的风险很多,其中政治风险的检测、评估和预测是个难题。

政治风险是指国际经济活动所面临经营环境中出现的一些不连续性的难以预料的事件,由政治变化带来的对某家企业的利润或其他利益有潜在重大影响时构成的风险。在非洲国家遭遇的政治风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球价值链发展变化与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研究”(项目编号:15ZDA060)、2016年江苏省学术学位研究生(博士生)科研创新项目“中国能源资源对外直接投资的价值链选择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长江三角洲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开放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6JJD790025)阶段性成果。

险中,影响最大的是政治不稳定。和其他地区相比,非洲是世界上政治较不稳定的地区,在全球风险评估公司 Maplecroft 公司发布的 2014 年度报告对全球冲突和政治暴动指数排名中^[1],非洲 53 个国家中就有 6 个位居前十位^[2];在非企业还遭遇了政府政策风险,如非洲大多数国家能源资源丰富,出于对自然资源的过度依赖,大多数国家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政局动荡有时导致外资企业资产被新政府征用没收。如 2011 年北非政局开始出现动荡,导致中石油旗下长城钻探工程公司在利比亚、尼日尔、叙利亚、阿尔及利亚等敏感地区的 6 个较大的海外项目合同中止,直接损失高达 12 亿元。2012 年的埃及、利比亚等国家开展的民主运动,政府先后出台政策,没收中国在非资产,并且严格限制对非洲投资(张爱玲,2016)。这类不可控的政治事件破坏了非洲各个国家的和平与稳定,虽然发生政治事件的目标不是针对外国投资者,但是直接影响了外国的投资热情,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投资非洲的海外利益和人身安全不可避免地受到牵连和侵害。

本文则从对外投资的投资流量、投资个案数和行业构成个案数来实证检验政治风险和中国企业对非 OFDI 的关系。

二、文献综述

学术界针对不同的研究样本对政治风险和 OFDI 的关系得出不一致的结论。一是认为东道国政治风险和外资流入的显著负相关性。如 Nigh(1985)研究了政治事件对美国跨国公司制造业直接投资决策的影响,通过对不同国家组间关系对比,发现发达国家只受到国家间的冲突与合作的影响,而欠发达国家同时受到国家间和国家内部的冲突与合作的影响。Schneider and Frey(1985)估计了 80 个欠发达国家的 OFDI 流动的四种模型,其中包含经济和政治决定因素的政治经济模式,政治不稳定显著减少了外国直接投资流入。Busse and Hefeker(2007)对 1984—2003 年 83 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结果显示政府稳定性、内部和外部冲突、腐败、法律与秩序等决定了外资流入,政府不稳定不利于外资流入。Woodward and Rolfe(1993)分析了出口导向型制造业投资的定位,发现政治稳定性和投资之间的消极影响。Egger and Winner(2005)研究了 1995—1999 年 73 个发达和欠发达国家样本,发现了腐败和 FDI 的显著负相关关系。Clare and Gang(2010)研究了汇率和政治风险对美国跨国公司 OFDI 的影响,结果显示投资发达国家时,汇率对 OFDI 的影响较大,当投资欠发达国家时,减少政治风险将增加 OFDI。Cleeve(2012)研究了制度稳定和政府稳定对撒哈拉以南 40 个非洲国家的 FDI 流入的作用,发现政治风险对 FDI 高度敏感;二是东道国政治风险不是 FDI 流入的决定性因素,且两者不存在相关关系。如 Wheeler and Mody(1992)研究发现政治因素不会影响美国 FDI。Asiedu(2002)研究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 FDI 的影响,发现相同的因素在非洲不会有相同的效果,政治因素和 FDI 不存在显著关系。Sethi, Guisinger, Phelan et al(2003)也发现政治因素对美国 FDI 不产生显著影响。Li and Resnick(2003)研究了 1982—1995 年的 53 个发展中国家,研究发现政治稳定性不会影响 FDI,而民主将会促进 FDI。Globerman and Shapiro(2003)通过对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治理设施和 FDI 的研究发现,政治不稳定将降低该国的 FDI 流入,但不会影响 FDI 的盈利能力。Bevan and Estrin(2004)以西方国家为研究对象,东道国风险不是 OFDI 的决定性因素。

中国 OFDI 起步晚,中国企业与发达国家的风险偏好存在偏差。Ramasamy and Yeung(2012)研究表明中国民营企业要比国有企业面对更大的投资风险,国有企业更容易利用两国间友好关系规避风

[1]Maplecroft.Conflict and Political Violence Index.

[2]这六个国家分别是:中非共和国、南苏丹、索马里、刚果民主共和国、利比亚和苏丹。

险, Kolstad and Wiig(2012)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Quer, Claver and Rienda(2012)研究中国企业国际化行为,发现东道国的高政治风险没有影响中国跨国公司的发展,但 Guo and Wang(2014)研究认为中国 FDI 流入高政治风险的国家要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国内学者也存在不同的争议,一是认为中国企业是风险规避型,如赵青,张华容(2016)借鉴引力模型研究 2003-2013 年中国对 133 国家的 OFDI,研究结果发现东道国政治风险和中国企业 OFDI 存在明显负相关关系,类似的研究结论还有王建、张宏(2011),贺书锋、郭羽诞(2009),王海军(2012)。二是风险中立型,如张雨,戴翔(2013)研究认为政治风险对企业“走出去”不产生显著负影响,类似的研究结论还有韦军亮、陈漓高(2009),钞鹏(2012),彭红英(2012)。三是风险偏好型。方英,池建宇(2015)基于内部化理论和实物期权解释新兴国家的 OFDI 行为,研究认为中国 OFDI 倾向于政治不稳定的发展中国家市场,王永中、赵奇锋(2016)基于 2004-2013 年中国对 115 个国家的 OFDI 面板数据,研究发现中国 OFDI 有明显的政治风险偏好特征。

国内文献已有关于政治风险和中国企业对非洲 OFDI 的研究,多数文献围绕如何应对政治风险进行研究,如朴英姬(2009)、赛格,门明(2010)等;较少有文章对政治风险对中国企业对非洲 OFDI 的影响作出定量分析。蔡栋梁(2011)利用 2005-2007 的 OFDI 数据研究了中国对非洲投资决定因素,并没有发现政治环境对投资的影响。本文对样本选择和投资指标加以了改进。样本选择使用中国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名录》中的中国对非洲各国年度投资个案,再利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披露的中国对非洲各国投资流量数据,以国家作为匹配目标,最终选择非洲 20 个国家的 2006-2012 年的平衡面板数据,从投资流量,投资个案,投资行业结构个案数三个角度检验政治风险和中国企业对非洲 OFDI 的关系,从而使结论更为客观和可靠。

三、计量模型、方法和数据

1. 模型设定与方法选择

本文利用 2006-2012 年中国企业对非洲 20 个国家 OFDI 的平衡面板数据来检验政治风险和中国企业对非洲 OFDI 之间的关系。核心解释变量为政治风险,被解释变量为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指标。首先检验的是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之所以选择流量是因为流量能够较好地反应对外投资增长状况。考虑投资前期对当期的带动作用,借鉴张雨、戴翔(2013)的处理方法,被解释变量为投资流量当期值,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Ofdi_{it} = \alpha_0 + \alpha_1 Political_{it} + \alpha_2 Ofdi_{it-1} + \alpha_j X_{it} + \mu_i + \nu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次检验政治风险和对外直接投资个案数,仍采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进行计量回归,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Number_{it} = \alpha_0 + \alpha_1 Political_{it} + \alpha_j X_{it} + \mu_i + \nu_t + \varepsilon_{it} \quad (2)$$

最后检验政治风险和对外直接投资行业构成,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Industry_{it} = \alpha_0 + \alpha_1 Political_{it} + \alpha_j X_{it} + \mu_i + \nu_t + \varepsilon_{it} \quad (3)$$

在式(1)(2)(3)中, α_0 为常数项, $Ofdi$ 表示中国企业对非洲国家的投资存量, $Political$ 表示非洲国家的政治风险, X_j 表示模型一系列控制变量, $Number$ 表示中国企业对非洲国家的投资个案数, $Industry$ 表示中国企业对非洲国家投资的行业构成个案数, μ_i 为时间固定效应, ν_t 为个体(国家)固定效应, ε 为随机误差项。 $i=1\sim 20$, $t=2006\sim 2012$ 。

2. 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核心解释变量:东道国政治风险。目前已有多个国际评估机构定期对不同国家的政治风险进行评估,最为我国学者广泛使用的是美国政治风险服务集团下属的国际国别风险评级指南机构 Interna-

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 的风险评级。与同类风险评级机构相比,其政治风险指数涵盖国家较多,时间跨度长,应用广泛,国际认可度也高,该数据库是目前比较普遍使用和可靠的,因此本文选择该数据库的政治风险指标。该指标是月度数据,和已有文献处理方法相同,本文通过算术平均值获得年度指标,数值范围0-100。该指标越大表明政治风险越小。

被解释变量有三个,对非直接投资流量直接用中国企业在非洲*i*国投资实际流量(单位为万美元),数据来源于各年度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对非直接投资个案数用中国企业在非洲国投资个案数量表示,具体的方法是通过对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名录》筛选出中国对非洲每个国家的直接投资个案,从2000年到2015年中国对非洲共53国进行了3531次个案投资,鉴于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数据的可得性,只有20国满足2006年到2012年连续投资^[1],共有1486次个案。对非直接投资行业构成用投资不同行业的个案数表示,具体方法参考洪联英、陈思、韩峰(2015)对行业资本密集的划分,将投资行业归类为四大类:商贸服务、生产销售、技术研发以及资源开发,其中技术研发和资源开发数据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商贸服务和生产销售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通过对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名录》的经营范围这一项进行手工归类,得到行业构成个案数^[2]。

控制变量的选取:对政治风险和OFDI的研究,归根结底是对区位的选择研究,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主要有市场寻求、自然资源寻求、效率寻求和战略资源寻求四个,但是非洲与中国相比战略资源薄弱,较少存在战略资源寻求动机(慕绣如,李荣林,孟寒,2016),因此本文将从市场寻求、自然资源寻求和效率寻求三个动机析出本文的控制变量。市场寻求的目标是东道国巨大的市场潜力,市场规模越大,东道国居民人均购买力越强,越有利于投资者实现规模经济,用东道国人均GDP表示(单位为美元),数据来源于《UNCTAD 统计数据库》;自然资源寻求表现为东道国自然资源越丰富,越吸引企业前往(Buckley and Clegg, 2010),用东道国石油、天然气、煤以共同单位(tones)计量的年度生产总量衡量各国的能源资源禀赋,能源资源禀赋越高表明该国能源资源越丰富,数据来源于《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效率寻求主要表现为企业利用东道国低要素成本,东道国劳动力成本越低,越有利于降低生产成本,因此用东道国相对劳工工资水平表示(单位为美元),数据来源于《国际劳工组织数据库》。

另外为便于各年之间进行比较,国家层面(投资流量,东道国市场规模)时间序列数据均用2006年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最终得到2006-2012年包含20个国家共7年的平衡面板。表1为变量含义和数据来源,表2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变量(除了个案)的标准差均比较小,说明数据稳定,不存在极端异常值。

表1 变量的相关解释和数据来源

变 量	变量含义	数据来源
东道国政治风险指标 Political	衡量东道国政治风险,该值越大,政治风险越小。	《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
对非直接投资流量 Ofdi	衡量对非直接投资实际流量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
对非直接投资个案数 Number	衡量对非直接投资规模大小	《商务部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目录》手工整理
对非直接投资行业构成 Industry (Business, Produce, Technology, Resource)	衡量对非直接投资的行业构成	
东道国市场规模 Market	衡量东道国市场潜力大小	《UNCTAD 统计数据库》
东道国能源资源禀赋 Endowment	衡量东道国自然资源依赖度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东道国相对劳工工资 Wage	衡量东道国劳动力成本大小	《国际劳工组织数据库》

[1]这20国按照投资个案数由高到低分别为:尼日利亚、南非、赞比亚、埃及、加纳、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坦桑尼克、苏丹、刚果(金)、肯尼亚、津布巴韦、阿尔及利亚、莫桑比亚、乌干达、利比亚、加蓬、马达加斯加、摩洛哥、几内亚。

[2]投资行业构成个案数由高到低分别是:商贸服务、生产销售、技术研发、能源资源。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Ofdi	7.052	4.061	6.091	13.083
Number	10.614	9.282	1	47
Business	3.757	3.981	0	20
Produce	3.678	3.581	0	24
Technology	1.757	1.977	0	14
Resource	1.285	2.241	0	14
Political	4.019	0.180	3.596	4.285
Market	6.911	2.034	-4.605	9.671
Endowment	0.799	2.667	-4.605	4.464
Wage	1.368	1.102	-0.916	3.333
N	140			
n	20			
T	7			

注:以上变量(除了个案)均为原始数据取对数

表3 各相关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

	Political	Ofdi(-1)	Market	Endowment	Wage
Political	1	0.0393	0.2775	0.1986	0.2944
Ofdi(-1)	0.0393	1	0.1048	0.0479	0.0627
Market	0.2775	0.1048	1	0.3160	0.2944
Endowment	0.1986	0.0479	0.3160	1	0.3271
Wage	0.2944	0.0627	0.2944	0.3271	1

四、计量结果及分析

对计量模型(1)(2)(3)估计结果之前,先检验解释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表3为各相关变量的系数矩阵,可以看出解释变量之间并不存在多重共线性,接下来对计量模型进行估计。

每个国家的政治风险都不同且不相关,考虑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在估计模型(1)(2)(3)之前,用Hausman检验是选择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传统的Hausman检验假定随机效应有效,模型(1)中Hausman检验的p值在5%下拒绝原假设,因此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回归式(1)。表4是对计量模型(1)的估计结果。表4中的被解释变量为Ofdi流量,解释变量为政治风险,Ofdi滞后一期、东道国能源资源禀赋、东道国市场规模和东道国劳动力成本三个控制变量同时纳入到计量模型(1)。结果显示,无论是固定个体还是固定时间,政治风险指数的回归系数为正,但是并不显著,这说明非洲政治风险指数不对我国企业Ofdi流量产生显著的影响。可能的解释是,中国与非洲国家政治上相对比较友好,同时中国企业整体对非洲的政治风险意识还不够敏感,对政治风险缺乏深入的了解,也不存在风险偏好。接着观察另外三个控制变量,滞后一期Ofdi对本期Ofdi流量表现出明显的带动作用,说明投资经验是投资非洲的重要因素。东道国能源资源要素禀赋指标在个体固定效应显著为正,东道国市场规模变量在个体固定效应显著为正,东道国劳动力成本指标显著为负。这符合Ofdi的资源寻求、市场寻求和效率寻求动机,说明东道国资源、市场和低劳动成本是吸引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

模型(2)中Hausman检验的p值大于10%,不能拒绝原假设,因此随机效用更有效,表5为计量模型(2)的估计结果,同时列出了固定和随机效应估计结果,被解释变量为投资个案数,解释变量为政治风险,同时东道国能源资源禀赋、东道国市场规模和东道国劳动力成本三个控制变量

表4 对计量模型(1)的回归结果

	Ofdi	
	个体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Political	-0.124(-1.27)	-0.131(-0.77)
Ofdi(-1)	0.121*(-2.53)	0.118*(-6.97)
Endowment	1.6166*(1.88)	1.014(1.72)
Market	0.957*(1.72)	0.888(1.44)
Wage	-0.374*(-1.68)	-0.385*(-1.77)
Country	Yes	Yes
Date	NO	Yes
N	140	140
R-sq	0.263	0.197
Prob > F	0	0
H检验	0.0140	

注:括号下方为T统计量,*、**和***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

表5 对计量模型(2)的回归结果

	Number		
	个体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Political	0.715*(-2.32)	0.776*(2.5)	0.290*(-2.34)
Endowment	0.055*(1.83)	0.0354(1.42)	0.008(1.16)
Market	0.006*(-1.83)	0.0001(0.46)	0.0004(1.23)
Wage	-0.0004*(-2.48)	-0.0005*(-2.23)	-0.0003*(-2.26)
Country	Yes	Yes	No
Date	NO	Yes	No
N	140	140	140
R-sq	0.576	0.518	0.09
Prob > F	0	0.0014	0.02
H检验p值	0.1054		

注:括号下方为T统计量,*、**和***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

同时纳入到计量模型(2)中。结果显示,政治风险指标的系数估计值为负,且在5%的水平下对投资个案数有显著的影响。这表明,政治风险越小的国家越吸引更多的企业前来投资,政治风险越高的国家越不利于企业前往。这与模型(1)并不矛盾,原因在于中国企业对风险偏好不同,国有企业可以利用两国之间的建交关系(Ramasamy and Yeung, 2012),投资非洲的资源类、技术类等资本密集度比较高、涉及金额比较大的行业,而民营企业没有良好的资金渠道,更加偏好投资于商贸服务、生产销售等劳动密集型行业。本文的统计数据也显示,2006年到2012年中国对非洲OFDI投资个案中,中央企业投资275次,地方企业投资1211次,民营企业走出去数量庞大,相对国有企业拥有资源优势,民营企业将承担更大的投资风险。因此面对东道国政治风险,大部分企业将采取风险规避态度。结合模型(1)估计结果充分说明中国企业总体的投资流量虽然不受到政治风险的影响,但投资个案数将会随着风险增大而减少。接着观察其余控制变量,只有东道国工资水平在个体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系数均为负,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对投资个案数有显著的影响,说明低劳动成本将吸引更多的企业前来投资,非洲市场存在效率寻求动机。

模型(3)中分别对四个行业商贸服务、生产销售、技术研发、能源资源个案数分别进行回归,如表6-1、6-2所示。商贸服务的Hausman检验p值在5%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因此选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生产销售Hausman检验的p值大于10%,不能拒绝原假设,同时选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进行回归;技术研发的Hausman检验p值大于10%,因此不能拒绝原假设,同时选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进行回归;能源资源的Hausman检验p值在5%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因此只选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回归结果显示,政治风险指标对技术研发和能源资源的个案数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说明政治越稳定,越有利于技术研发和能源资源行业进入,而政治风险对商贸服务和生产销售行业个案数

表6-1 对计量模型(3)的回归结果

	Business		Produce		
	个体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个体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Political	0.092(0.76)	0.291(1.62)	0.032(0.27)	0.165(1.56)	-0.073(-1.60)
Endowment	0.019(1.05)	0.015(1.09)	0.0001(0.01)	0.0001(0.01)	-0.003(-0.53)
Market	0.0001** (2.50)	0.0006(0.84)	0.0001(0.01)	0.0004(0.03)	0.001(0.94)
Wage	-0.604** (-2.56)	-0.331(-1.31)	-0.364** (-2.1)	-0.222(-1.25)	-0.225** (-1.97)
Country	Yes	Yes	Yes	Yes	Yes
Date	NO	Yes	NO	Yes	Yes
N	140	140	140	140	140
R-sq	0.3358	0.4527	0.588	0.222	0.1387
Prob > F	0.0006	0	0	0.034	0.0009
H 检验 P 值	0.0154		0.4685		

注:括号下方为T统计量,*,**和***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

表6-2 对计量模型(3)的回归结果

	Technology		Resource		
	个体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个体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Political	0.100(0.98)	0.215** (2.36)	-0.024(-0.91)	0.043(0.65)	0.290** (2.53)
Endowment	0.006(1.38)	0.007(1.72)	0.0002(0.13)	0.0062** (2.08)	0.001*(1.92)
Market	0.001(2.88)	0.0001*(1.77)	0.001(1.16)	-0.001(-0.57)	-0.001(-1.63)
Wage	-0.272** (-2.13)	-1.112(-0.83)	-0.120*(-1.83)	-0.232** (-2.09)	-0.002** (-0.003)
Country	Yes	Yes	Yes	NO	Yes
Date	NO	NO	Yes	NO	NO
N	140	140	140	140	140
R-sq	0.1707	0.2862	0.1413	0.1389	0.350
Prob > F	0.0001	0.0041	0.0511	0.1807	0.0224
H 检验 P 值	0.2219		0.0433		

注:括号下方为T统计量,*,**和***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

不具有显著影响。原因在于,技术研发和能源资源行业属于资本密集度比较高的行业,行业进入门槛要求较高,能够进入的企业一般规模偏大,具有完善的风险防控机制,能够及时应对和处理风险,商贸服务和生产销售类劳动密集度较低的行业进入门槛较低,规模偏小,对风险的认识不够,这与企业 OFDI 尚缺乏有效风险管理和协调机制有关,甚至有些小企业在遭遇政治风险事件后,为了减少企业负面消息,不及时进行风险预警和控制,就导致部分企业进行 OFDI 时忽略了政治风险这一关键因素,因此进行劳动密集行业的企业对政治风险表现不敏感。接着观察控制变量,东道国能源资源禀赋变量只对能源资源行业具有显著正影响,说明能源资源越丰富,越能吸引该行业进入。东道国市场规模变量回归结果不显著,劳动成本回归均为负,且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对投资行业个案数具有显著影响,这一结果较好说明了非洲劳动力成本优势对我国企业 Ofdi 的影响,劳动力成本越低,越吸引我国企业对非洲 OFDI,进一步证明了非洲市场的资源寻求和效率寻求动机,但对非洲的市场寻求动机并不明显。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 2006—2012 年中国对非洲 20 个国家的 OFDI 的平衡面板数据,分析了东道国政治风险、东道国要素禀赋、东道国市场规模、东道国相对工资水平对中国企业 OFDI 的流量、投资个案和投资行业个案数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非洲各国政治风险指数变量对我国企业 OFDI 流量不具有显著影响,对投资个案数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对技术研发和能源资源类资本密集度较高的行业个案数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对商贸服务和生产销售类劳动密集行业个案数不具有显著的影响,这说明非洲各国政治越稳定,吸引企业投资个案数越多,吸引技术和能源资源行业投资个案数越多,但是对 OFDI 流量、商贸服务和生产技术行业个案不具有影响。

第二,从控制变量来看,东道国市场规模变量、东道国能源资源要素禀赋变量和劳动力成本变量对 OFDI 流量具有显著性影响,这表明,东道国资源、市场规模和低劳动成本是吸引中国企业 OFDI 流入的重要因素。对投资个案数和行业构成个案数的影响并非如此,只有低劳动成本显著影响投资个案数和行业构成个案数,这表明,非洲劳动力成本越低,越吸引我国各行业企业前往效率寻求;另外东道国资源禀赋变量只对能源资源行业个案数具有显著正影响,这符合经验判断,即东道国能源资源越丰富,越能吸引该行业进入,但投资个案数和行业构成个案数对东道国的市场寻求动机表现并不明显。

根据以上两个结论,本文的研究结果有以下三方面的政策含义。

首先,如何应对非洲政治风险问题。我国企业应该树立较强的政治风险意识,企业与企业之间需建立良好的信息传递机制。如今无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还是中小企业均在对外直接投资主体中占有一定份额,国有企业数量较少,但是实力雄厚,投资规模大,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主体中虽然占据很大一部分比例,但个体投资规模偏小,风险意识薄弱,很多企业在投资过程中存在盲目性,缺少对政治风险的深入认知,对政治风险表现不敏感。因此,需要在企业与企业之间建立良好的政治风险共享机制,吸取各方投资经验,重视政治风险的影响。

其次,如何提高我国规模偏小企业的抗风险能力。我国规模偏小企业需加强境外合作,或与当地企业合作,实现规模效应。众所周知,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投资规模和抗风险能力远远不如国有企业,且风险意识薄弱,非洲国家政治稳定性都比较差,企业“抱团”可以壮大企业实力,逐渐实现规模经济,提高风险预警意识和抗风险能力。虽然政治风险难以消除,只能被削弱,“抱团”企业应积极与当地政府政策靠拢,或与当地企业进行合作共赢,或组建合资企业,合资企业可进行利润让步,以分散风

险,整体增强抗风险能力。

再次,如何有效利用当地市场资源。相关部门可建立健全东道国市场资源信息数据库供企业查询。中国企业投资盲目性的根本原因在于无法深入了解东道国市场资源信息,国有企业可以通过政府对非洲的援助战略,享受非洲某些信息优先,但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则完全是通过对市场的观望实施市场导向型投资战略,忽视其他很多不确定性风险的存在,这就需要相关部门建立健全东道国市场资源信息实现数据共享,前往东道国投资自然就很大程度上能够准确把握市场信息和规避风险。

参考文献

1. 张爱玲:《中国企业对非洲OFDI的政治风险及防范》,〔北京〕《国际经济合作》2016年第9期。
2. Nigh D. The Effect of Political Events on United States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A Pooled Time-Series Cross-Sectional Analysi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85, 16(1):1-17.
3. Schneider F, Frey B 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World Development*, 1985, 13(2):161-175.
4. Busse M, Hefeker C. Political risk, institution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Hwwa Discussion Papers*, 2007, 23(2): 397-415.
5. Woodward D P, Rolfe R J. The Location of Export-Oriente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Caribbean Basi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93, 24(1):121-144.
6. Egger P, Winner H. Evidence on corruption as an incentive for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5, 21(4):932-952.
7. Clare G, Gang I N. Exchange Rate and Political Risks, Again// Rutgers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2010:46-58.
8. Emmanuel Cleeve. Political and institutional impediments to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flows to sub-Saharan Africa. *Thunderbir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12, 54(4).
9. 赵青、张华容:《政治风险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太原〕《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6年第7期。
10. 王建、张宏:《东道国政府治理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研究——基于东道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福州〕《亚太经济》2011年第1期。
11. 贺书锋、郭羽诞:《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析:政治因素重要吗?》,《上海经济研究》2009年第3期。
12. 王海军:《政治风险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东道国与母国两个维度的实证分析》,〔蚌埠〕《财贸研究》2012年第1期。
13. 张雨、戴翔:《政治风险影响了我国企业“走出去”吗》,〔北京〕《国际经贸探索》2013年第5期。
14. 韦军亮、陈漓高:《政治风险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武汉〕《经济评论》2009年第4期。
15. 钞鹏:《政治风险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昆明〕《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16. 方英、池建宇:《政治风险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意愿和规模的影响——基于实物期权和交易成本的视角》,〔昆明〕《经济问题探索》2015年第7期。

〔责任编辑:天 则〕